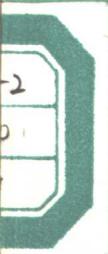


郭沫若研究

9



文化艺术出版社

郭沫若研究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郭沫若研究》编辑部编

(京)新登字140号

郭沫若研究

9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郭沫若研究》编辑部编

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怀柔县东茶坞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 201,000 插页2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200 册

ISBN 7-5039-0986-2/Z·9

定价：5.00 元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编：林 林

副主编：黄侯兴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世民 朱成甲 李福田 林 林 周自强

秦 川 高国平 黄侯兴 彭静中 雷仲平

本辑执行编辑：

蔡 震

目 录

“我的郭沫若观”学术讨论会

- 出世的襟怀，入世的本领.....邓牛顿(3)
 ——我的郭沫若观
- 我的郭沫若观：关于一种
 文化人格与文化精神的省察.....潘世圣(8)
 女神再生：郭沫若的生命之歌.....李继凯(24)
 表现自我和失去自我.....顾圣皓(40)
 ——郭沫若创作的成功与失落
- 消解：郭沫若的文化宿命.....章亚昕(54)
中西撞击中隆起的文化峰峦.....税海模(61)
 ——我的郭沫若观
- 女性与审美：选择中的困惑与冲突.....周海波(74)
 ——换一个角度看郭沫若历史剧
- 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郭沫若.....朱贵平(88)
“我的郭沫若观”学术讨论会评述.....(96)

文学研究

- 《孔雀胆》与《哀格蒙特》的比较研究.....傅正乾(103)

加皮尔与《加皮尔百喻》	周 红(120)
——兼论对郭沫若的影响	
郭沫若与胡风四十年代浪漫主义创作思想的	
对比思考	陈丙莹(137)
创造社文学的情绪写实主义特征	朱寿桐(148)
——兼论郭沫若创作的写实倾向	
从《女神》看“五四”时期郭沫若的生死	
变通意识	高 杰(164)
论郭沫若人格系统	黄丽华(178)

佚文·书信

作者寄言	郭沫若(193)
郭沫若的一篇佚文	王泉根(194)
集外诗两首	郭沫若(196)
题扇两首	郭沫若(198)
西江月	郭沫若(199)
致柏木正一(一函)	郭沫若(200)
致坂田昌一(一函)	郭沫若(201)
致坂田信子(五函)	郭沫若(202)
致山冈望(一函)	郭沫若(206)
致藤井骏、长野士郎(一函)	郭沫若(207)
致长野士郎(一函)	郭沫若(209)

史 料

访安娜的故乡	马良春(213)
郭沫若《创造十年》杂考	陈福康(222)

路，在开拓……〔日〕中央文化映画社制作 刘德有译(233)

——中国科学代表团访日纪录

影片《路，在开拓》与柏木正一……………刘德有(251)

关于郭沫若的生死……………潘汉年(258)

后乐园与丹顶鹤……………晓味(260)

回忆郭沫若先生……………〔日〕古川元宣 钟作英译(262)

国 外 研 究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性格…………〔日〕秋吉久纪夫 刘秀媛译(271)

编后记……………(286)

**“我的郭沫若观”
学术讨论会**



出世的襟怀，入世的本领

——我的郭沫若观

邓牛顿

我们仰慕郭沫若的天才，仰慕他百科全书式的成就。但回顾这位文化巨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那真是蜀道行军，崎岖不平；三峡驾船，波翻浪叠。他算得上是一个个性极强的人，算得上是一个喜爱闯荡的弄潮儿。可历史给他安排的，那困厄，那艰险，绝非他自己的想象所能预料。然而，他依然成就了自己，辉煌地成就了自己。

那么，他靠的是什么，渡过那困厄，战胜那艰险？人们可能会有百十条不同的回答，而我却认为，这靠的是他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广博吸取与精心锤炼出来的十个字：出世的襟怀，入世的本领。

1920年3月3日，郭沫若给宗白华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大谈特谈他的艺术观和人生观。“要有出世的襟怀，方有入世的本领”，就是他在这封信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他的人生哲学观点。这时候，他已经二十八岁，即将迈入而立之年，能对自己的处世哲学作出如此精妙的概括，可以说正值其时。

很长时期以来，人们普遍注意对作家世界观的研究，而世界观中又倚重于对政治观的研究。相形之下，对作家人生观的

研究、对作家处世哲学的研究，就显得异常薄弱。实际上，一个人的政治观根源于他的人生观。政治观的真正实现又得依赖于处世哲学的实施。人生观是政治观的根底，政治观得依靠人生观的支撑，有赖于处世哲学的保证。更何况政治生活本来只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把什么都归结为政治，牵扯到政治上，这并不符合人生实际。

我一直认为，出世的襟怀、入世的本领，贯穿着郭沫若整个的人生道路。无论是投身政治激流、潜心于学术的海洋、放情于自然的山水、忘情于艺术的园圃，直至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人伦关系，他都能时时刻刻、认认真真地履行着这种处世哲学。将出世的襟怀视作做人的前提，把入世的本领看为做人的根底。出世与入世，相涵互补。襟怀与本领，交替为用。

大凡实际生活中的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算入世了，就得接受人世上来自四面八方的挑战。要出世，除非没入幽冥。即便是那些皈依佛门、隐入山林者，也并非真正的出世，充其量遁世而已。而接受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洗礼的郭沫若，跟近代中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一向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学医也好，从文也好，都是为着救民众于水火之中。遁世哲学似乎与他始终无缘。我们读他的《创造十年》，那里记载着他青年时代的思想历程。他曾经引用了一首“五四”之前处于矛盾、感伤的心境时的诗作：“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说明他那时早就在认真地思索着入世与出世的问题。而入世，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此后不久，“五四”壮潮强烈地震撼了他的心。祖国黎明的曙光、民族新生的希望，鼓舞着他，激励着他，坚定了他入世的信念——走创造者的道路。他知道“创造者的孤高”、他知道“创造者的

狂欢”、他知道“创造者的光耀”，但他依然要高唱《创造者》的赞歌，高张《创造者》的旗帜。

郭沫若二十年代初在确立他的人生哲学时，曾经把自己比做“朝而登山，夕而落谷的人”。剖析着自己：“我的灵魂久困在自由与责任两者中间，有时歌颂海洋，有时又赞美大地。我的 Idea（理想）与 Reality（现实）久未寻出个调和的路径来，我今后的事业，也就认定着这两种的调和上努力建设去了。”^① 如何调和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呢？他终于将儒家的入世精神与道家的出世精神紧密熔铸在一起，形成他独特的儒道合一的人生哲学。入为根底，出为导引；能出能入，时出时入；该出时出，该入时入；似出似入，亦出亦入。既承担起社会的责任，又保持着个性的自由。

在中国这风云变幻的岁月里，在中国这举步维艰的环境中，郭沫若找到的这种人生哲学，有很大的适应能力。北伐战争九死一生、海外十年艰辛度日、抗战八年苦苦周旋。在政治的漩涡中，在学问的探究里，在生活的煎熬下，他，正是凭借着广阔的胸怀、豁达的气度、过人的才智、实干的精神，才闯过了一道道急流险滩，在时代的洪流中，高扬起开拓者的风帆。

回顾“五四”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有的堕落了，有的沉沦了，有的隐逸了，而郭沫若却云帆直挂，激流勇进。不少人一生热衷于在名利场中角逐，在风月场中厮混，蝇营狗苟，鼠目寸光，浑身市井气，百般脂粉情。可郭沫若用人生实践证明：有出世的襟怀，才能有开阔的视野，历史的眼光，恢宏的气量；有入世的本领，方会有明晰的路径，坚定的步武，扎实

① 《三叶集》。

的目标。处逆境时，经得起磨难；当顺境时，不盲目骄矜。一身风云气，千种爱国情。即便是被悬赏缉拿、遭侵凌侮慢、亡命海外十年，他也能沉下心来，垦殖着一片片学术的处女地，以弘扬我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坚韧努力，渡过了那漫长的羁勒的岁月。

或许有人要问：郭沫若不是服膺于马克思主义么？他怎么还奉行儒道合一的处世哲学？不错，马克思主义曾经为现代世界的许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可作为实践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人生哲学的表达方式与实施途径。更何况，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囊括全部丰富的人生内容，更不能取代浩瀚的人类精神遗产。它只是人类思想文化智慧的一个部分。惯于用一元论来看问题、分析人与事的，在复杂的、多元的精神现象面前，不能不瞠目咋舌，无以言对。记得十年前，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艺报》上曾发表了一组《沫若书简》。郭沫若在那些信件中，或探究宇宙万汇，或探讨诸种学理，或探求人生实际，他都能坦荡而谈，秉着出世的襟怀与入世的本领这一总纲，“立人立己，达人达己”。比方在一封致重庆教师的信中，他一方面严格地自砺：“我自内省，实毫无成就。拿文学来说，没有一篇作品可以满意。拿研究来说，根底也不踏实。特别在解放以后，觉得空虚得很。”另一方面又宽怀地导人：教育事业“值得终身以之”；“不要轻视它”；“在四川住了十二年并不算长，重庆的偏僻正需要好的教师”；“希望您仍然打起精神，为西南文化建设服务”。分析自身，启发他人；为人处事，都真诚、实在。我觉得这才是真实的郭沫若，郭沫若的绝顶聪明之处。凭着他的高明的处世之道，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之中，稳稳地把握住自己，驾驭着自己。

总结郭沫若的一生，可以说是运用既有传统质素又有时代光色的处世哲学的成功范典。他既执著又豁达、既现实又浪漫、既执笔又持枪，在文武两个战场上驰骋。他既效命于国家民族，又葆有着独特气质，是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和谐统一的楷模。而不像当今少年人，既要反文化，又要创造文化，让人相信他们的文化哲学；既要扩张“自我”、忌恶“向群”，又拼命抱怨社会群体没有给他荣誉，给他桂冠，以致陷进了自相矛盾的怪圈，难以自拔。

郭沫若已经作古了。他有数不清的缺点错误，但他很有自知之明。他写过一篇《谢陈代新》的文章，提醒从事人文科学的研究人们，“为了接近那一‘家’，便把那一‘家’视为图腾，神圣不可侵犯，那是最不科学的态度。”我一向不想把郭沫若视作图腾，视作神明，但我永远仰慕他诗人的气质与学者的才华，仰慕他那儒道合一的处世哲学，这就是我的郭沫若观。

——1989年5月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

70周年。上海——青岛

我的郭沫若观： 关于一种文化人格与文化精神的省察

潘世圣

一、知识分子属于人类。同时又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内在精神品格，因此他们具有坐标和文化标本意义。对郭沫若亦当作如是观。

郭沫若是历史留下的一种文化现象，在当事人和后人的眼里，关于他的图景竟是那样不同，这使得他更富魅力，吸引和考验着人们的注意力与理解力。

在本文中，郭沫若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文化现象而被考察的。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和思想质量都决定了他们属于敏锐清醒和先进的社会群落，代表了时代的文明水准；因此他们比其他任何社会阶层和集团都具有超越的品格和能力。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抽象概念，是超国家、超民族的，他们某些基本的共同特征，使得概念阐释具有通用性。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栖息于各自不同的地域，依附不同的社会、文化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等等，从而注定了知识分子

的民族文化性。在这个层次上，知识分子最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心理特征及其主要意义。换言之，描述和阐释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思维方式、行为模式，透视知识分子的灵魂，是理解民族文化的有效视角。

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较，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条件，成长的历史过程以及经受的冶炼都十分独特。就整个状态而言，中国知识分子显得丰厚复杂而且微妙，明快的线条似乎很难勾勒出这群人的形象，他们是复杂和矛盾的综合体。不过，所有这些都在民族传统文化的笼罩之下。本文将以文化人格为视角，描述郭沫若人格的结构形态，展示其相对的静态图景，特别是动态中的演变轨迹，揭示在内外力综合作用下的诸种矛盾，寻找他的文化性格的多元特征，从而逐渐破解这个现代中国的文化神话，为选择和重构新的文化人格提供一点思考。

二、喜剧中的郭沫若及其启示。“五四”是郭沫若最为成功的时期，这时，他体验和积聚了一生中最丰富、最完整、最自由的现代感和文明精神，确立了具有普泛意义的文化人的形象。

要考察郭沫若作为一个相对纯粹意义上的文化人在历史文明发展中的完整面貌，就必须潜回到“五四”时期的文化和思想王国中去。“五四”是一个开放而通畅的时代，那个世纪洋溢着真正的文化自由精神，充满着由衷的宽容，平等大度的文化气氛簇拥着人们。知识分子则格外潇洒从容地展现自己的思想、心

智和才情，诘问并阐释世界。而主体也在自律的境界中不断实现着自我。在这种综合性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虽然郭沫若的文化价值判断、思想指向以及行为模式都还带有矛盾的复杂色彩，但在总体上，他的文化心态和文化品格都呈现出活跃、前趋的特征，一些方面还具有骁勇的创造精神。

（一）蛮勇的挑战意识。所有的杰出思想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充满着怀疑精神和挑战意识，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青年时代马克思的信条之一，就是“怀疑一切”；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尼采则疾呼“上帝死了”，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在这类思想家的大脑中，传统世界和现实世界都不是赞颂和崇拜的偶像，而是怀疑审视与批判的对象，超越的意愿构成了他们从事思想探索的动力和导向。“五四”时期，青年郭沫若与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思想特征，即高亢的挑战激情。那一时期，郭沫若正努力谋求人性和个性的解放，他以敏锐鲜明的直觉感受着外部世界对自我的沉重压抑，渴望生命力的奔突和个性的复原，这使他对传统、现实的整体燃烧起叛逆和挑战的精神火焰。他要破坏一切，凤凰再生，反抗既成道德，反抗既成宗教，反抗一切不合理的畛域。这种挑战意识，在他的《女神》中借助了天马行空的庞大艺术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挑战意识应该是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介入社会生活并参与社会实践的基本精神前提之一。需要注意的是，挑战在郭沫若的意识形态中主要表现于含有相当大直觉和感性成份的情绪，而缺少冷静的理性深厚和科学风格；这样一来，便容易产生起伏多变的现象，很难形成精神与实践相统一的完整的过程。

（二）开放的心理倾向。在近现代中国，任何人在进行文化探索时，都逃脱不了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主